

主编 梁自洁

● 山东 ● 现代 ●

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主编 梁自洁

山东现代

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1

山东教育出版社



鲁新登字2号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

第一集

梁自洁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375印张 5插页 43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

ISBN 7—5328—1221—9/Z·46

定价 8.15 元

序 言

张 全 景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一集），是由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组织编写的。从提出课题到编成定稿，历时两年，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家立传，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意深义远，在我省亦属首创，可喜可贺！

齐鲁山河，人杰地灵，自古为文明之乡，学者名家灿若群星；在现代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收入《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的学者专家，学识渊博，造诣精深，潜心治学，献身实践，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省内外乃至国内外颇享盛名。为他们出书立传，以生动、具体、翔实的材料介绍他们的生平际遇和成长道路，宣传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推崇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成功经验，弘扬他们献身社会科学事业的高贵品质，有利于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广大读者，尤其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借鉴，从而推动全省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选入本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均已年逾花甲或近古稀、耄耋，有的已经鞠躬尽瘁。虽然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不同，具体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不同，但是，都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饱尝了困苦和忧患，也体验了解放后当家作主的欢乐与自豪，感

124384
FV34/13

受到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与伟大，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锐利与精辟。他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即使在“十年动乱”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历苦难而志弥坚，经风雨而情更切”。他们把自己的所学所长，无私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们勤奋学习，博览穷蒐，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以长期不懈的奋力拼搏，在各自的工作领域独树一帜。他们甘作红烛，乐为人梯，呕心沥血，诲人不倦，一息尚存，耕耘不已，为革命和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总之，他们的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广大知识分子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正可以大显身手。党的爱护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似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吹暖了知识分子的心窝。老一代专家学者，必将焕发出青春与活力，继续做出新的可贵贡献！中青年知识分子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必将以老一代为榜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成绩！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全景

副主任：梁自洁

委 员：段义和

郭庆惠

吕秀卿

主 编：梁自洁

副主编：吕秀卿

郭庆惠

目 录

序 言	张全景 (1)
王统照	(1)
黄云眉	(28)
高 亨	(46)
冯沅君	(68)
郑鹤声	(87)
张维华	(123)
华 岗	(139)
陆侃如	(158)
萧涤非	(175)
田仲济	(203)
殷孟伦	(223)
童书业	(238)
高 兰	(269)
傅统先	(285)
卢振华	(305)
吴富恒	(321)
严薇青	(344)
王仲莘	(363)
殷焕先	(387)
孙昌熙	(403)

刘泮溪	(419)
蒋维崧	(434)
刘祚昌	(451)
薛绥之	(468)
冯中一	(494)
孙祚民	(510)
戚其章	(545)
安作璋	(573)
牟世金	(592)

王 统 照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笔名息庐、鸿蒙、剑先等，山东省诸城县相州镇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山东省文联首任主席。他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方面的卓著贡献，在三十年代初期颇有影响的长篇巨制《山雨》、《孤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不屈的人格以及解放后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而勤奋工作的精神，使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一

恩格斯曾经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3页）中国的“五四”也是这样的时代。当王统照1918年离开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到北京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的时候，文学革命的号角刚刚吹响，时代将这位富有文学才华的青年推向潮头。

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荆棘丛生的荒漠里为人民开辟出一条羊肠小道的中华儿女。文学革命时期由于多方面的贡献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记下了王统照的名字。

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虽然是新生事物，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毕竟是在幼年。它面临着十分强大的敌对势力：以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还有当时影响较大，危害亦广的鸳鸯蝴蝶派。新文学要想稳住阵地，一方面必须从理论上将其战败，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地拿出过硬作品来。为此做出贡献的，当然要首数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而王统照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首先，王统照积极宣传“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观。他先后主办了《中国大学学报》、《曙光》、《晨光》、《批评》、《晨报副镌·文学旬刊》，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耿济之等共同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据粗略统计，在“五四”前后的短短两三年里，王统照就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七十余篇。这些论文的核心就是宣传新文学所应具有积极社会作用，批判以“消遣”和“游戏”为目的的文学观念。

批判游戏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积极社会功能，是文学研究会的共同主张，也是茅盾早期现实主义主张的基本精神。而王统照的文学评论与茅盾的主张同一步调，成为茅盾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的得力助手。

王统照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即通过揭露社会的黑暗使处于麻木昏迷状态的人民大众惊醒过来。他公开表明自己创办《曙光》杂志是为了“惊醒提撕这个沉沦的社会”，斥责那些载道之文、牟利之文失去了文学的资格。他指出，当今文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疾苦，以使人们认识丑恶的现实，并进而改变现实。由于文学是以生动

的形象反映社会现实，易于深入人心，所以王统照认为文学是治疗中国民众麻木病的良药。他很欣赏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作品，因为它们生动形象地揭露了社会的罪恶，其作用“比社会党员的主张，更要锋利”。王统照的这些主张，对文学革命运动的前进起着铺路的作用。

“五四”时期，社会上流行过一些无聊的刊物，如《快乐》、《星期六》、《红笑》、《游戏世界》等，专门刊登一些吟风弄月和哥哥妹妹之类的诗文小说，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既恶劣又广泛。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919年11月，王统照就撰文指斥泛滥于北京街头的这些无聊报刊“是北京社会的一种百斯笃菌，也是首都地方第一个的大污点。”“若是讲到改造社会，非先把这类的东西去掉不可。”“一天不去掉，便是为改造社会一天的障碍。”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将小报的思想、主旨、材料、文字，全个儿‘舍旧谋新’，来一个大大的改造。”（《北京小报》〔下〕，《曙光》第一卷第一号）后来，他直斥鸳鸯蝴蝶派：“对于反文学的作品，盲目的复古派与无聊的而有毒害社会的劣等通俗文学，我们却不能宽容。”（《本刊的缘起及主张》，《晨报副镌·文学旬刊》第一号）在王统照等文学革命先锋的猛烈攻击下，猖獗一时的鸳鸯蝴蝶派终于败下阵来，并逐渐消声匿迹。这就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其次，王统照在文学革命初期的散文和戏剧理论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诗和散文始终是古典文学的正宗。我们有着非常丰厚的古典散文传统。但是在“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虽曾发生过多起文学革命运动，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运动都未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整个文艺理论、反映到散文理论上来。因此，我国的古典散文理论，一方面是同源远流长、异彩缤纷的古典散文相适应，极其丰富多样；另一方面，又有它的局限性。后者主要表现在：一、古典散文理论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二、古典散文理论也始终未能划清与韵文相对的广义散文同狭义散文即纯散文的界线。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带有破旧立新的时代特点，因而上述古典文论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散文理论里，都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王统照在这方面起着先锋作用。

新文学的头一个十年，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散文的概念从一般的广义散文向纯文学散文的概念发展；二是散文理论的倡导者较侧重于输入外国的散文理论；三是突出散文要写“实”求“真”，要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征的要求。这三个方面，在王统照的散文理论里都有所体现。

除了周作人的《美文》（刊于1921年6月8日《晨报副镌》）外，王统照于1923年6月发表的《纯散文》和次年2、3月间发表的《散文的分类》就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理论著作了。当然，刘半农早在1917年5月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第一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但他说的“文学散文”是指与“诗歌戏曲”相对的“小说杂文”，即指一切带有文学性质的散行文字。他当时还划不清小说和文学散文的界线。在周作人和王统照等人的论文里，已不是把散文仅仅视为广义的散行文体，而是当作狭义的特殊文学形式。这标志着当时文

学界对白话文学散文特质认识的深化和飞跃。例如，周作人把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称之为“纯散文”，并说它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同时，他们又都把文学散文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看作是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特殊文学样式，这就为新文学中的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立定阵脚打下了理论基础。

但也须指出，王统照的散文理论带有“五四”时期人们对中国古典作品优秀传统估价不足的偏向，较侧重于介绍欧美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把散文分为历史类的散文、描写类的散文、演说类的散文、教训的散文、时代的散文即杂散文或杂文五种。这一分类法，是根据亨德的理论，举例也以外国散文为主，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

除此之外，王统照还对旧戏改革和戏剧创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洪深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里说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中国戏剧界，“理论非常丰富，创作却十分贫乏。”就是在众说纷纭之中，王统照的声音仍旧清晰可闻。他的《高士倭绥略传》和《剧本创作的商榷》就是关于戏剧如何改革的论文。前者，王统照借介绍高士倭绥这位英国作家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强烈呼吁中国的戏剧家应该作高士倭绥那样的社会批评家，中国的新型戏剧应该象高士倭绥所写的戏剧那样，对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戏剧作家的责任，也指明了戏剧创作的方向。这在“五四”那个启蒙时代，其意义、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后者，即《剧本创作的商榷》，对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以及剧本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剧本创作十分贫乏的时代，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再次，王统照还以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多种作品丰

富了新文学的百花园，显示了新文学的丰姿和实绩。在“五四”时期的几种主要进步刊物里，如《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月刊、《戏剧》等，到处都可以看到王统照的名字。他是“五四”文坛上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作家。

现存的资料证明，王统照是“五四”前后就发表白话小说的有限的几位作家之一，正如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所说：“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不过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人。”茅盾在革新《小说月报》时所想到的小说作家，首先就是王统照。后来结集的《春雨之夜》是当时较早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叶》和《黄昏》的出版更填补了当时中篇小说创作的空白。王统照还是继胡适等有限的几位诗人之后创作新诗的人，《童心》也是继《尝试集》等有限的几本诗集之后出版的新诗集。此外，他的散文集《片云集》中的散文，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剧本《死后之胜利》，也都是新文学最早的收获。这些作品，从某一个侧面揭露了黑暗社会制度的罪恶，描绘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同时也真诚地裸露了一位看不清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到大革命期间内心的忧郁、烦闷与彷徨，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王统照的这些作品，努力吸收传统文学与西欧名著中的营养，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创造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文学样式，为新文学的枝叶繁茂、百花竞妍做出多种探讨，这是十分可贵的，尽管这些作品有稚嫩之处，但既然出现在文学革命时期，是开拓者的足迹，其意义、价值就应当充分肯定。

二

王统照对诗歌创作有独特的见解。如果说他在“五四”时期对新文学的贡献突出了一个“早”字，那么他对新诗的见解则以“深”见长；如果说他在新文学理论建设方面体现了一位文学青年的开拓精神，那么他在诗歌理论方面的见解则表现了一位学者的深邃目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统照首先是位诗人。他自幼学写旧体诗，到六十岁过世，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剑啸庐诗草》、《童心》、《这时代》、《夜行集》、《横吹集》、《江南曲》、《鹄华小集》等七部诗集，而且还总结了新诗创作的经验。由于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深厚的功底，对外国诗歌也有精湛的研究，所以对诗歌创作有许多真知灼见。

王统照认为，新诗首要的是必须具备真实的情感。他曾说：“诗为心声”，“志在心中，抑遏不住发而为变化多方又有节奏言辞，这便是诗。”（《旧诗新话》、《青纱帐》，生活书店1936年10月版）这就是说，诗歌首先要有充实的内容，诗人必须有健康的思想，美好的情操。

新体诗，也叫自由诗。自由、好做，既是它的优点，也几乎成了它的一大弊病。有人将分行的散文称之为诗，这实在是对新诗的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新诗在量上的泛滥，质上的滑坡，严重地损害了新诗的声誉。这个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有所暴露，引起关心新诗成长的有志之士的注意。早在文学革命初期，自由诗刚刚兴起，王统照就独具慧眼，提出了一系列建

设新诗韵律的宝贵见解。他指出，诗与散文“最大的分别乃是诗有韵律的节奏的自然，由热情中冲发而出，更多音乐化的妙用与感人的想念的。”（《对于诗坛批评者的我见》，《诗》一卷三号）他还根据我国传统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创作经验，指出“自来的诗无不有韵、有节奏”。如果诗歌失其音乐性，失其叫做诗的特点，那也就不成其为诗了。正是节奏和韵律，才使诗歌与小说、散文等形式区别开来；也正是节奏和韵律，才能大大加强诗歌的抒情气氛，获得如鲁迅所说的易记、易懂、易唱、易听的艺术效果。在新诗发展的初期，王统照提出了这一问题，期待引起新诗作者们的注意，是颇有见地的。

后来，王统照又对如何建设新诗的节奏和韵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认为新诗的节奏、韵律与旧体诗词的节奏、韵律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自然的节奏、自然的韵律，是现代入活生生的声音在诗歌艺术上的自然体现；后者却属于人工制造，与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新诗的节奏是根据内容创造的，它可以根据作者所发表的思想内容的不同而随时改变节奏形式，而旧体诗词的格律与内容没有任何关系，是僵硬不变的，王统照所主张的诗歌节奏，既不是古典诗词那种固定不变的节奏，也不是“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节奏，而是适合表达现代人的思想而又灵活多变的自然节奏。

根据初期新诗创作“显、露、透”的缺陷，王统照大胆提出了写诗要讲究“手法”的观点。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颇富哲理的话：“别的文字也许容易在其中弄点玄虚，诗歌要是居心去弄玄虚便成了一个难看的空壳。然而在一切文艺的体裁中独有诗歌可真有点玄虚的所在。这话似乎是自相矛盾？须知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不同于小说、戏剧，也就在这一点上。”（《这

时代·序》、《这时代》，1934年版）他反对故弄玄虚，主张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情感，又说“真有点玄虚”是指写诗要注意手法，比起其他文学样式来，诗歌更富人工性。他认为写诗就是“使用繁杂变化的文词、言语把想象与同情凑合成一朵美丽而具有生命的花”，必须讲究手法。

应该把诗写得含蓄、深沉，也就是要求使用种种手法将诗义遮掩起来，让读者有回味琢磨的余地，这是王统照所说的做诗要注意手法的第一层意思。诗歌不仅要求达意，而且要求兴感，最忌讳的就是太直、太显、太露，缺少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曲折。王统照的这些论断无疑是给予初期白话诗歌作者的清凉剂。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是贯彻了这一理论的。他的诗，如同深渊中的游鱼，深沉而隽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对诗歌的字句进行人工琢磨，即通过反复思考、认真推敲，寻求最恰当的词句来表情达意，这是王统照所说的写诗要注意手法的第二层意思。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的创作实践证明：诗不改不工。好的诗句不可能自然形成，要下苦功夫锤炼。王统照借鉴古人经验，指出新诗的创作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不可一挥而就。不仅对诗篇的布局、段落要反复运筹，甚至于一个字的音响、一个标点符号都须认真考虑。但在强调写诗要讲究手法的同时，王统照还指出“诗要自然，作于不得不作，止于不得止”。他追求的是象“自然”一样的“手工品”。

王统照的诗论，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一方面认为真情实感是诗歌的“元气”，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表达手法是构成诗歌的重要条件；一方面认为新诗必须有韵律，具有音乐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有出息的诗人决不应为这些“小技”束缚住手脚；一方面认为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歌最忌讳玄虚，另一方